

今天,请给父母一个“拥抱”

子欲孝而亲不待.对于那些家有年迈父母的人来说,所要思考的更迫切的问题是,在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如何尽己所能给予父母更多精神上的抚慰。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王昱

又是一年重阳时。央视近日推出了“2012我的父亲母亲”的系列报道,在这则报道中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不少衣食无忧的城市老人表示,精神孤独是他们目前最大的问题。一位老太太在被问及最希望什么的时候,竟然回答:“恨不得快点死。”采访的记者后来在微博

上说:“当时就不想提问了,只想抱抱她,安慰她不要伤心。”

“只想抱抱她,安慰她不要伤心”,记者的这个表述无意中击中了当下很多老年人“老无所依”问题的症结所在。老人们所寻求的依靠,并非完全是物质上的,他们所期盼儿女做的,只是能常回家看看,对老人进行精神上的“赡养”。

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孟子所畅想的“五十者可以衣

帛,七十者可以食肉”的理想社会,在今天已经能够相对轻松地达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赡养老人就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一方面,很多老人在退休后,原来依附于工作而建立的社交圈迅速萎缩,加上以楼房为主的居住条件限制,子女成为老人为数不多的能说话的人,此时父母对于子女在情感上的依赖就凸显出来。而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竞争的日渐激烈,为人子女者每天都面对着来自经济

与社会的种种压力,很多人甚至患上了“下班沉默症”,缺乏人际交流不仅存在于子女与父母之间,而是日渐弥漫于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中国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让很多人乃至整个社会把金钱和社会地位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每个人都是社会人,对人的评价也应该是多元的,一个成功的人在工作中当然应该是一位好员工,但与之同样

重要的是,他也应当是家庭里的一位好儿子、好父亲。简单的物质赠与不能代替对父母在精神上的抚慰,从这个意义上说,再忙也要常回家看看,不仅是一种道德号召,更是对个人价值的重新定位。“常回家看看”中所要回到那个“家”,并不仅仅是父母养育我们的那个家庭,更是我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所应该回归的那种价值定位。

随着老龄化社会正在提前到来,中国很可能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面临未富先老问题的大国,以独生子女为养老主体的倒金字塔形家庭结构无疑加剧了这一问题的解决难度。养老主体由个体向整个社会转变才是最终解决之道,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子欲孝而亲不待。对于那些家有年迈父母的人来说,所要思考的更迫切的问题是,在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如何尽己所能给予父母更多精神上的抚慰。今天,让我们给父母一个“拥抱”吧。

公民论坛

事件观

“月薪9000元才不惶恐”很不靠谱

□浦江潮

近日,一份调查引发网友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上下浮动。(10月22日《华商报》)

这样的新闻无疑是吸引眼球的,于是被各大网站置于显要位置,并引起网友如潮的评议,相信还会有不少时评人据此阐述“民生焦虑”之类。不过,我却想弱弱地问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些调查数据本身靠谱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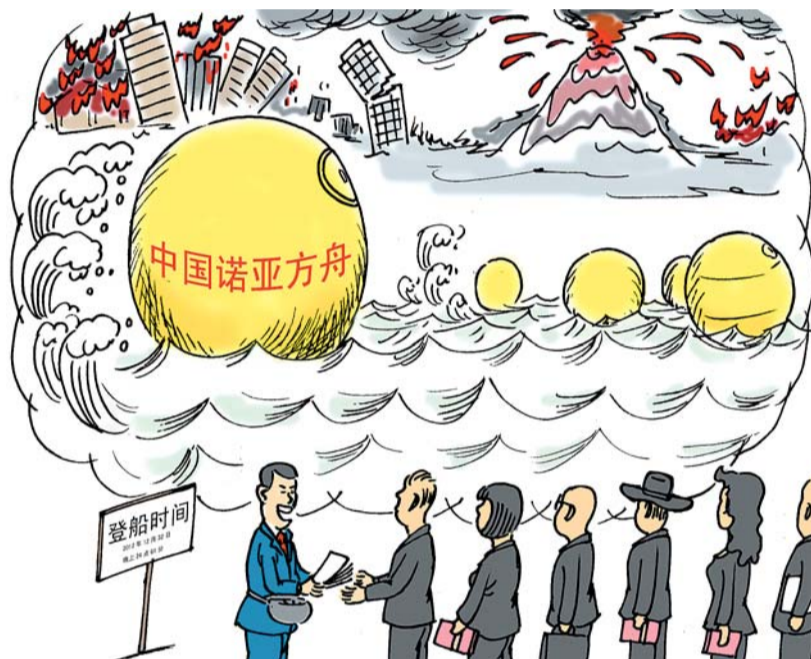
这些数据是怎样得出的?哪个单位或哪个人主持了这项调查?调查了多少人、哪些人?这些信息新闻中没有提及,在网上也无法查到,这就不免让人生疑。实际上,

像“月薪多少会让你生活不惶恐”这样的调查,要想得到准确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统计力量何其强大,其发布的调查数据尚且时常引发质疑,何况是“月薪多少会让你不惶恐”这种见仁见智、并无标准答案的调查?

其他城市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对上海的情况略知一二。我的很多朋友在上海一所高校任教,职业是体面的,收入相对而言也是不错的,但他们的月收入大多没有达到9000元。生活的压力甚至焦虑当然有,但“惶恐”肯定谈不上。按照官方统计数据,2011年上海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51968元,月均工资约为4331元,还不到9000元的一半。想想看,如果月薪9000元以下便“生活惶恐”,那么大多数在上海工作的人

岂不都惶惶不可终日,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其他城市的情况想必也差不多。

其实,高收入者也会有各种压力和焦虑,而低收入者也会有各自的幸福和快乐。粉饰太平、淡化甚至漠视民生焦虑的倾向固然要不得,但夸大其词、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方式故意放大民生焦虑的做法同样令人生厌。一线城市月薪9000元以上,二线城市月薪5000元以上生活才不惶恐,这样的调查数据不仅不靠谱,而且置绝大多数国人于难堪的境地,似乎月薪达不到这个数字就应该诚惶诚恐,就不配幸福、快乐地生活着。据此我有理由怀疑,参与“月薪多少会让你生活不惶恐”这项调查(如果确有这项调查的话)的人,大概多为那些内心里洋洋自得、口头上矫情四溢的白领、金领们吧。



富人“方舟”

浙江义乌商人杨宗福开发的球形密封应急救生舱,目前已经接到了21个订单。因为每位顾客有不同的需求,所以每个“诺亚方舟”的售价在100万至500万元之间。杨宗福的客户都很“神秘”,最大的订单来自于山西的一个老板,他一个人就定做了15个,不仅自己用,还要送亲戚友人。

这样的“诺亚方舟”就是一笔生意,其实是在赚冤大头的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别人无权过问。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不是应当为现世的所有人打造一艘能幸福活着的“诺亚方舟”呢?

李振忠/文



赵国品/画

>>媒体视点<<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

改革进程中谁都没有理由当看客

《人民日报》22日发表文章指出,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同时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与此相关,一些人出现了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对国家快速发展和生活不断改善感到振奋、满意,另一方面对社会上的许多现象和问题感到困惑、纠结。众多个体的矛盾心态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矛盾期心态。

矛盾心态首先体现在对我国现实状况的评价及未来趋势的判断上。理性地看,我们告别了贫穷,国家空前的强大,值得欣喜;感性地说,社会上问题丛生,生活中不便多多,尤其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令人焦虑。于是,有的人心灵底片上就出现矛盾,爱恨兼有、褒贬不一。由此而来,对我国未来发展的趋势心存疑惧、首鼠两端,有时感到有信心、一片光明,有时觉得没把握、一片灰暗。

矛盾心态集中体现在对自身利益得失的感受及行为进退的选择上。改革开放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利益增进,也有利益调整。而利益增进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同等受益,利益调整则会让有的人暂时受损。于是,有的人心理天平上就出现失衡,虽然认识到改革开放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自己受益,却总觉得自己所得不够,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由此而来,在行为选择上无所适从、进退失常,有时心态阳光、积极进取,有时得过且过、敷衍塞责。

文章强调,对于这种矛盾心态不可大意。如果引导得好,使其中的正能量迸发出来,就可以推动事业发展、平稳度过矛盾凸显期;反之,其中的负能量就可能释放出来,加剧社会矛盾,影响事业发展。

对于前者,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今

天的中国并非尽善尽美,改革开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国的发展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大势所趋,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我国现阶段的问题都不是发展中、前进中的问题,只有也一定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

对于后者,应遵循科学规律加以引导。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谁都没有理由当看客,只分取“红利”,而不承担相应的代价或阵痛。我们决不能怨天尤人、患得患失,在离心离德中消耗力量、影响大局。惟有坚持从我做起,同心协力改变现实的不足,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减少乃至消除自己心中的不满和不快。

(原标题:《矛盾期心态》,作者:郑剑)

■本版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秦淮川

广州市纪委常委梅河清通报称,初步查明蔡彬在担任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副局长、番禺城管综合执法局局长、政委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经商开办企业等重大违纪问题。目前,纪委已对其采取“双规”,接受进一步调查。(本报今日A17版)

蔡彬落马有两大启示。其一,网络反腐具有不容低估的威力,应该鼓励,并为网络反腐提供更开放的平台和健全的制度保障。如果没有网友举报,蔡彬也许依然高枕无忧。

其二,健全官员财产申

报制度,起码应保障这一制度落到实处。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统计,在2011年1月启动首次集中报告工作中,除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因出国、患病就医等客观原因未按时报告外,全国共有100多万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报告了个人有关事项。其实,蔡彬当初也申报了财产以及个人有关事项,但很显然他弄虚作假、蒙骗组织。

此外,有一点不能不提,这几年广州市城管系统频现腐败案件。今年2月,广州市黄埔区城管系统曝出受贿窝案,包括原局长刘晓金在内的7名干部被立案侦查;本月17日,原广州市天河区城管局局长曾伟宇涉嫌受贿案开

庭,检方指控曾伟宇涉嫌受贿金额共25万元。本月18日,越秀区城管局原局长黄桂芳涉嫌受贿约178万元,在广州市中院受审。如今再联系到蔡彬,这不免使人发问,广州市城管系统到底怎么了?还有没有潜伏的腐败官员?是不是凸显出城管系统是个腐败高发的行业?

“房叔”被双规,是反腐的一次小小告捷,值得欣喜,不足以惊喜。通过“房叔”落马,更应该意识到,应将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结合起来,发挥各自所长,弥补各自短板。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民众的反腐热情,那些涉嫌贪腐的官员必定有所畏惧,收起贪腐之念。

卫生部败诉是法治胜利一小步

□欧木华

2010年发布的生乳新国标,有业内专家认为是企业“绑架”下出笼的。对此,郑州消费者赵正军要求卫生部公开生乳新国标制定会议纪要被拒后,将其起诉到法院,法院近日判令卫生部在法定时限内作出答复。(10月22日《大河报》)

北京市一中院作出这样的判决,无疑是法治的胜利,尤为难得的是,卫生部辩称该会议纪要一旦公开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增加行政管理工作负担”,法院对这个解

释没有采信,而是认定“会议纪要即属于卫生部在履行其法定职责过程中制作的政府信息,卫生部不予公开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这说明法院在判决的时候更重视法律思维,而不是以行政思维来主导判决。

其实,这样的进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1年7月,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决铁道部15日内向公民杨金柱就“铁路部门卖餐车的座票,依据到底是什么呢?”问题申请信息公开作出答复。2007年北京现代沃尔以“财政部不作为”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北

京市一中院做出判决,要求财政部必须给予答复。

当然,在肯定“法治的胜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何答复,依然是卫生部说了算。再者,如果卫生部在下一个“国标”制定过程中,依然不公开信息,是不是又得依靠公民提起诉讼?仅靠公民诉讼这种方式,力量终究有限,重要的是应该促成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比如,规定卫生部这样的部门在制定“国标”的同时,应该第一时间在卫生部网站“同步上传”会议纪要,如能做到这一步,我们才可以说,这是法治的真正胜利。